

酒罐“商标”揭秘 800多年前 “南海I号”来过广州(下)



“南海I号”出土的“玉液春”印文酱釉罐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科技分析和研究表明,宋代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大量向广州输送,是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出口国外,而“南海I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该沉船上的部分货物与广东省陶瓷窑口生产地和广州贸易古港直接相关。

5.“南海I号”最后的离岸港口

广州,地处珠江入海口,濒临南海,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自汉以来就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唐代,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交往进入第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中国僧侣,如义净等都是搭乘外国商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求佛法的。开元二年(714年)始设市舶使,与地方长官共同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成了唐朝唯一设市舶

使的港口。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返程途经广州,见到珠江江面上停满了装载着堆积如山的香料、宝货的外国商船,城里杂居着众多的外国商人。此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广州城还保存有当年海外商聚居的“蕃坊”和祈风导航的光塔。贞元元年(785年),杨瑤受命出使阿拉伯地区,他舍弃陆上丝绸之路,改由广州登船经海上丝绸之路成功抵达黑衣大食,成为目前所知中国第一位由海路抵达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使节。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这艘唐代的商船装载了大量中国的瓷器,其中包括不少广东陶瓷器。再结合考古资料和史料,可确定“黑石号”曾停靠过广州。

1997年,在印尼

爪哇海发现了一艘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亚籍商船——“印坦沉船”。根据船体结构和船上货物,以及铸有“桂阳监”等字样的银铤、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等,研究者确定它是从当时的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贸易归来,在返航途中沉没的商船。

宋开宝四年(971年),中央政府最早在广州设市舶司,主要负责对海货征税和专卖等。此外,朝廷还要求市舶司及所在地方官员对各国海商举行宴会热情接送,海舶初到之时“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设宴欢送。元丰三年(1080年)修定施行的《广州市舶条》即以广州来命名的,这个条例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上贸易管理基本法。绍兴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长官楼(见图1)请求朝廷按广州市舶司的标准来接待海商,得到批准。这些无不体现广州在宋代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

综观历史文献记载和沉船考古发现,唐宋时期,广州作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十分稳固。

这次南海诸窑抢救性考古发掘与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不仅确定了宋代

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广州公使酒库和私人酿酒作坊装酒所用的酒罇是由南海诸窑专门烧制的。“南海I号”装载了大量广州生产的公使酒和私酒,以及用南海窑酱釉罐盛装的咸鸭蛋等航海食品,应是它停靠广州期间,受到广州地方官员热情接待馈赠和贸易所得,这些发现为确认“南海I号”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这一结论既有考古实物资料坚实支撑,又符合当时远洋航行规则,更符合大历史的时代背景,纠正了此前认为“南海I号”没有到过广州的观点。

6.未结束的结语

“南海I号”是宋代南中国海至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繁荣的重要见证。这是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地区商品生产的集中、航线及沿岸贸易港口城市的繁荣、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

日渐完善的必然结果。经过考古类型学比对+现场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最终厘清了南海诸窑、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I号”沉船三者之间的关系。“三南”合作研究以及将聚落考古的方法应用到水下沉船发掘和研究的模式,为确定海上贸易商品产地、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重构船上社会生活和海上国际贸易网络等,创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模式,未来可期。

文物和遗址是历史的“活化石”,是传承和展示历史最好的物质载体。佛山市南海诸窑考古发掘、“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最新研究成果,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宋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等历史图景,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和广东故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奇石窑采集的姓氏款和文头岭窑采集的“梁宅酒”印款罐残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